

网络与性别研究的新议题^{*}

张敬婕

摘要: 网络与性别研究,是信息时代与新媒体普遍发展背景下,媒介与性别研究(Gender Communication Studies)体系中一个充满创造力与研究活力的分支研究方向。文章概述了国外关于网络与性别研究的四个新议题,展现了该领域研究的新特征与趋向,包括对信息时代的性别鸿沟的判别,梳理了有关妇女接近信息和传播技术(ICTs)的核心议题,分析并阐释了在新信息和传播技术领域对妇女进行研究的六个主题和三项缺失,呈现了女性日记体博客阅读中身份认同与解读文本的范式。

关键词: 网络;性别鸿沟;缺失;认同

作者简介: 张敬婕,女,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中国传媒大学 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北京,100024)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2010)05-0043-09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第一和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分别发生于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这两波思潮带来的是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领域的权利保障,也为整个学术界带来了更多批判性、解构性的新视角与新观点。

20世纪末,有学者称,信息时代网络与博客的兴起,带来了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波浪潮。其巨大的影响力在于,各层次的妇女及妇女群体,都借由网络技术和博客等信息平台,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参与权、表达权与批判权。

本文通过概述国外四份网络与性别的研究文献,指出网络技术在某种程度上的确降低了妇女对新技术的接近难度,一些网络平台为妇女的独特经验与交流需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对网络乌托邦的政治本质有所认识,并非所有妇女都能无条件的、不加区别地受益于网络信息,也并非所有妇女都能够实际地运用网络技术来为自身的发展服务。

一、信息时代的性别鸿沟

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在经验领域更趋向于感性,从而不能像男性那样自如地掌握理性知识与技术技能,因而在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天然地”抱持了一种排斥和消极的态度。但是,布鲁斯和罗伊(Agnetha Broos and Keith Roe)在《信息时代的边缘:性别鸿沟真的消失了吗?》^[1]一文中反驳道,她们的研究证明了尽管性别是一个有意义的区分要素,但电脑使用经验是决定对电脑焦虑和态度最重要的指标。也就是说,强调女性在电脑使用上比男性更无知、更无能的论断,是基于性别歧视的一种认同,不具有科学依据,也不具有学理论证上的真实性。

在布鲁斯和罗伊的调查中发现,使用电脑的受访者一般比未使用者年轻,且受教育水平更高,有更高的学历水平。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分析,男女两性在网络的使用和对网络的态度方面的确有所不同。诸多研究者均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适应和控制网络环境。男性比女性通常花费更多的时间在网络上,而且不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社会性别视野下的媒介研究”(07JA860002)的研究成果之一。

同的性别使用网络的目的并不相同。

最近,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性别鸿沟可能会快速缩减。随着女性使用网络和电脑的经验逐渐累加,使用网络和电脑的需求越来越大,使得实际使用网络和电脑的女性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她们在使用网络和电脑时表现得更主动。

然而,总体上看,女性对网络或电脑的使用仍处于低层次,而且对于花时间在新科技的使用上,男女两性的差异也依然是显著的。比如,当女性使用网络来查找信息或通邮件时,男性往往在跟踪新闻、访问新闻集团的网站、收听和下载音乐,或玩电脑游戏,或访问色情网站。

诸多的研究结果均显示,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家中,在接近和使用新媒体方面,男女有着显著区别。在使用电脑的时间长度上,使用电脑的功能类型上,男女之间的使用情况也不尽相同。因此,学者纷纷提出,需要认真探讨男女对新传播技术的态度是否也因其所处环境而有所不同。

调查显示,女性对电脑表现出更多焦虑和负面的态度。对于电脑感到焦虑的主要原因是电脑使用经验的多寡。其次产生影响的因素是受教育程度。而在受众对电脑的态度方面,电脑使用经验和年龄这两个指标往往有最大的影响力,一般是缺少电脑使用经验的、老年的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电脑持消极的态度。

布鲁斯和罗伊调查的目的是考察在欧洲范围内性别鸿沟是否还存在。而结果显示,在新媒体使用方面,至少在接受问卷调查的这个地区,性别鸿沟依然明显。男性无论是在工作岗位还是在家中,对电脑有更多的接近机会,使用率也相对频繁,对电脑的态度相对积极且更少焦虑。而在手机的使用方面,则没有典型的性别差异。

总而言之,评估对电脑的态度和焦虑感方面,电脑使用的经验多寡是最重要的影响指标。因而,提高女性的电脑使用经验是消除性别鸿沟的首要之路。

二、有关妇女接近信息和传播技术(ICTs)的核心议题

行动网络理论和社会建构分析说明了技术的发展是一个社会过程,也是社会更广阔的发展中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组成部分。为了取得成功,新技术的生产必须和新社会实践、新社会构成联系起来,且新社会实践和新社会构成必须接纳和使用新技术。已经实施的新技术实践证明了这一过程必须要有性别敏感。

一些研究学者近年来关注的重点也正在于此:传统女性对信息和传播技术(ICTs)不断提升的途径何在之前所做的那些提升妇女 ICT 接近的种种措施和效果并不理想的原因所在?

软件工程师斯科特、社会科学家莱斯利和操作工程师勒奈特(Anne Scott, Lesley Semmens and Lynette Willoughby),共同撰写了《妇女与网络:一项研究报告的自然史》^[2],并提出将性别敏感纳入信息传播技术领域的迫切性——如果女性主义者再不做些积极的行动,那么电子网络领域将很快成为一个“没有妇女立足之地”的境地。

如果妇女不能很好地适应现行的新技术标准,她们将发现自己被现行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模式所边缘化。就如哈德威所说“不适应一个标准与不在这个标准内存在是两码事。”因而可知,性别与信息传播技术相结合的需求已相当紧迫,因为一旦具有性别隔离的新社会技术标准被稳固地建立起来,那些不能在这个现实中适应的群体和个人,不仅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也必须接受被边缘化。

(一) 三个重要研究议题

要想梳理妇女与信息传播技术的关系,首先需要认识三个重要议题:网络乌托邦、极度兴奋、被绑定在固定位置上。

议题1:网络乌托邦

从莫妮卡的著名的 PEN 网络事件可知，网络可以为妇女提供更多的工作可能和参与自由。大量存在的、出于政治目的的、由行动者所成功运行的事例，强化了网络乌托邦的乐观主义。比如 cyber - girls 及其他女性主义网站，已经为妇女在网络上打开了友好的空间。

最初是通过电子邮件，政治性的网络成功地影响了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影响到会议最初的日程和与相关 NGO 组织结合的程度。左罗阿斯托运用网络将一个地方性的议题提升到国内外政治领域。在万维网上方便而低成本高利润的出版行为，为国际妇女在线杂志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网络的使用明显地加强了地方与全球网络的连接，也开启了新社会和政治建设的可能性。

但需要警惕的是，网络乌托邦作为一种表述，对两性在网络的接近权、控制权上表现出的显著差异的描绘，有着非常牢固的盲目性。尽管乌托邦女性主义者忙着论证只服务于女性的可替代的公共空间的好处，她们无法挑战当下网络技术的使用现实——通过工业大亨，全球犯罪网络，军事策略，财富经济和国际种族主义——逃避了社会规则，建立了政治控制和经济力量的新的集中。这样的背景下，妇女往往成为技术的牺牲者而不是受益者。

议题2：极度兴奋

如果网络乌托邦属于科学神话的类型，“极度兴奋”则属于带来恐慌性的类型，它由可视的潜伏者、不详的预兆、色情甚至是网络强奸犯所组成。女性主义对于信息传播技术的讨论中也有致力于其他议题研究的，比如针对在网络上循环发生的无端性侵犯的主题。两位从事这类研究的作者对网络色情这样评价：“在这些案例中，新传播技术不仅帮助父权制社会中扭曲的性观念的产品道德化，也帮助那些损人利己的人寻找新的牺牲品，制造反文明的社会和损人利己的暴力的组织。强奸犯或恋童者能够和他们志同道合的人联系起来，共同创造一个使不正常变为正常的事实上的世界。”

其他学者的研究发现，男性试图垄断网上交流，甚至当交流的议题与女性的兴趣和经验紧密贴近的时候。赫曼认为，网络上的性别垄断是导致女性使用者沉默的根源。

男性暴力的使用将妇女和儿童作为牺牲品，控制女性的行为，把女性完全排除出公共空间，这个事实扩展了新的网络公共空间。在恐慌类型的表述中，女性常被表现为暴力无助的牺牲者，在这方面，“极度兴奋”在它的文化基础中是真实的。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表述往往被高度误导了，大多数网络使用者有很多办法来控制或避免威胁和暴力。无助的牺牲品也不是大多数女性的经验，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其他地方。

议题3：被绑定在固定位置上

网络早已被反复描述为新的公共空间甚至是新的公共场域。妇女在这些空间中却仍然处于不被表现的境地，妇女往往被限制在更为狭小的私人空间里，被限制在印刷的、最接近的、面对面的接触模式上。

在十九世纪，印刷的世界允许被地理性割裂的女性主义者们相互联系，因此建立了国家范围内的政治性的网络。通过用笔来表现内心世界，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主义者们能够使私人空间的限制情况得以好转，并对观念的公共世界造成影响。她们颠覆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布局。

通过神奇地重新定义公共与私人的当下的概念，信息传播技术可以提供相似的机遇给二十一世纪的女性主义者们。

那些被绑定在固定位置上的女性们，应该和她们被认为所归属的女性空间、女性能力和女性欲望的偏见进行斗争。她们必须自己争取必要的物质资源：不仅是“一间自己的屋子”，也有属于她们自己的电脑，和使用电脑所必需的软件、教育、培训、时间和空间。随着旧有的空间和位置被新的信息流的布局所颠覆，妇女面临着双重挑战：她们必须守卫她们本土空间来反抗由无实质的全球化带来的威胁，同时，她们必须新的电子传媒中创建自己的空间并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

“被绑定在固定空间”作为一种表述，对时间、空间、教育背景、文化期待和就业机会等物质束缚高

度敏感,因为这些正是使妇女对信息和传播技术的接近机会和抱负受到限制作用的因素。对这些建构性的神话所操控的研究表明,妇女为获得网络而需要克服障碍仍旧相当可观。格伦蒂指出,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通过网络获得职位;亚当和格瑞进一步指出,把“不熟练”建构为妇女工作,在妇女使用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工作领域就可能将妇女所拥有的低自主水平的处境合理化。

女性主义者们在对机会的扩充上进行了努力争取,因此,一些妇女在她们的生活道路和她们在公共领域的发展中,可以克服很多的障碍。同样地,“被绑定在固定位置上”作为一种表述,与妇女在科技中、妇女在科学与技术中、女孩进入科学和技术等方面拥有平等机会的话语,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使机构的文化发生改变,促使女孩和妇女对自身的期待更高。在使一部分妇女从事科学与技术职业的过程中,这些目标已取得显著的成功。然而,她们也因为个人主义而受到批评。为了帮助那些不考虑已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问题、公共/私人空间的割裂问题、和当前技术的性别分化的文化问题,而希望在科学与技术的男性世界中有所成就的妇女个人,她们冒着减弱对个人能力不足问题的结构化质疑的危险。

(二) 三个核心提问

第一,“接近”意味着什么?

对于“接近”概念化的研究挑战了将信息和传播技术使用者看作最初和最终的消费者的观点。只要如威利所指出的,“接近”意味着职员和消费者有权使用,就很难去对抗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获取信息和传播技术的普遍平等机会,要等基于更多动态的个人的因素所建立起来的工作网络建立起来之后,才能很好地被建立。比较而言,斯科特、莱斯利和勒奈特更倾向于把信息和传播技术的使用者看作公民——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代理人。她们对于“接近”的概念有助于对技术的行动者网络分析。人们需要提出的问题将会变成:妇女是否已经被接受为电子公共领域的工作者和制作者,或者是全部的公民或代理人?

达顿建议,不能在把信息和传播技术添加到人们的能力和资源中这样的简单的思路下,去考虑信息和传播技术的接近问题。相反,必须要考虑接近的地理性:人们获得接近的手段是什么?这些新的连接取代的是什么呢?人们会用在网上冲浪来取代到当地的图书馆,取代在高速公路的 Natwest 存钱,取代花时间和邻居聊天,可能和在东京的电子邮件使用者建立亲密的友谊?总之,曾经重要地建立在地理上的亲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已经被新的空间流动——即建立在情投意合或特殊服务的提供基础上的网络所取代。

对于接近的提问,不能基于个人化的基础之上。而且,还必须被转化为与技术的社会相联系的问题。就如 May 所指出的“技术并不会自动地带来与它们相关的对抗的或合作的社会关系,技术是被置于发展它们的社会关系的使用。”新信息和传播技术将如何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什么样的新社会网络将被产生?这样的社会网络中将包含谁?那些对信息和传播技术、软件、培训和兴趣有着不同水平的人,如何去发现和建立一种方式去掌握一种微力量关系(这种微力量关系已经通过整合进新技术社会模式的需求,使人们陷入了信息流的混乱关系中)?

第二,“通过网络”意味着什么?

政治家和职业者倾向于把电脑和网络看作获取金钱和股票的工具,协助在公共领域和市场中,转化软件和数据,提升控制和操作能力。比较而言,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将电脑和网络作为出版途径。一个复杂的现实是,人们可以在网络上用非常低的成本出版作品,而不用通过出版商。这就使得公共平台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服务,促成更多民主认识论的发展。但同时也会使色情和暴力文本通过网络被制造和传播。在更多的家庭里,电脑和网络,最初和最主要的,是被作为玩具,主要被用于玩游戏。由于把电脑和网络当成玩具趋向于由男性所主导,充满了暴力和厌女的游戏,所以这种概念化在“极度兴奋”的话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对教师、科研者和家长来说，电脑和网络经常被作为图书馆来使用，用于知识的储存和传播、学习技术和科研发表。横向交流的令人震惊的发展——通过传真、电子邮件、会议、电子公告板、讨论区、多用户区域、聊天组和大型文件的电子转换——在很大的程度上，似乎迎合着对“网络乌托邦”话语的乐观态度。尽管如此，教育实践的应用使得某种职业对某种用途的刻板认识得以概念化。把电脑作为工具的观念，受到“把电脑和网络当作社会的中心”的最新的霸权制的理解的压力的。

第三，哪些妇女？

生活在同性别家庭或关系中的女性对新技术的使用比男性有更多的自信吗？如果妇女受聘于传播行动和/或付费的工作，妇女是否更有可能从事新技术的工作？使用网络的妇女多少比不使用者无能吗？她们受到的伤害在特定的类别里特别多吗？在混性别的家庭里，谁装载软件？设计桌面和投入其他基于虚拟的“筑巢”任务？

为何“妇女和网络”的关注点都在“网络”上？就如达顿在关于网页使用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一些信息和传播技术，是伴随着不同性别、社会阶层和人种的使用者的大规模的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指标发展的。这个研究表明，这些便宜和缺乏魅力的技术正被妇女有创造性地使用，用于地方社会结构的改造、社会布局的重新组织以及再造社会组织。这些非正式的行动，却被很少地研究过，且被置于信息革命的边缘一角。如果对信息社会中妇女保持社会性、政治性的有效行动的能力很关注，那么就不能使视角太狭窄。需要对信息革命本身进行认真的思考。

（三）应该关注的其他问题

三位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

1. 网络的军事、工业起源实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技术与妇女如今和未来的关系？
2. 那些认为“妇女早已被排除在新媒体之外”的论断意味着什么？
3. 在全球化地谈论妇女和网络的关系时，有哪些要点？
4. 为何关于妇女和网络的研究，如此紧密地与网络（以及真实的现实和其他有吸引力的新技术）相关，而忽略那些像网页和移动电话那样便宜、更普遍使用的以及可能更具有民主的技术呢？
5. 是否可能把网络作为一个单独的对象来加以概念化？
6. 是否可以将从编织在一起的故事中获得的那些复杂和看上去相互排斥的话语倾向加以整合？

三、在新信息和传播技术领域对妇女进行研究的六个主题和三项缺失

米奇·李（Micky Lee）《在新信息和传播技术中对妇女研究的缺失分析》^[3]一文，为全球女性政治经济研究如何丰富新信息和传播科技的知识主体提供了三条道路：第一，把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作为基础工业，强调它构成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第二，在对新信息与技术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中，注重对女性潜在角色的检视与分类；第三，检视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物，是如何被用作保持财富吸引力的意识形态的；通过物质资料生产、商品和服务，检视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女性劳工及其形象的剥削。

全球女性主义者认为，全球的不平等植根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全球贸易的压迫历史。由于政治经济领域众所周知的“性别盲点”，因此，像伊莲和艾伦等研究者在她们的出版物《性与金钱》中明确讨论了女性主义理论中所包含政治经济理论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已经在经济结构和组织中，采用了男性的偏见。”而全球女性主义政治经济观点可以丰富现有的女性主义知识体系，通过关注把技术和远程传播作为商品，以及女性在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中作为资源的状况，也通过在全球层面上加入阶级和性别的交叉视角来实现。

（一）六个研究主题

现存的女性主义学术知识中，妇女/性别被纳入到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研究中，可以分为六个主题，

分别是：

1. 一般理论化的发展

在理论发展方面，女性主义学者已经对基于男性气质的科技创新和在固定时空内科技的发明提出了疑问。一些研究报告甚至对“妇女”和“性别”的规范化概念提出质疑。哈德威对于虚拟博客的观点已经对女性主义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她的观点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哈若威曾经表示，她宁愿做一个电子人（cyborg）也不愿做一个女神。艾莲·格若汉姆通过描述伊利格瑞的“感性转换”（sensible transcendent）观点，指出电子人和女神都未对父权制的技术和宗教的结构予以解构。而且詹妮·苏丹也认为，哈德威对电子人和网络女性主义的话语建构，并不是非白人女性主义者、非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和非西方女性主义者所能接近和使用的。而且电子人的观点也因为未认识到重要实体的物质层面的属性而受到批评。

2. 妇女作为终端使用者和新技术的消费者

在把女性作为传播技术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研究中，有一些注重于为了研究当出于娱乐和教育目的，在网络论坛的技术使用和互动中，男性和女性是如何区别的。

专业研究妇女的学者均认为，技术话语对妇女并不友好，但也提供了原始的、创造性的、开创性的路径，使女性去创造新的方法和技术。

一些学者发现，通过讨论性别身份的流动性、地方性和含混的特征，以作为生物学意义和社会存在意义的男人和女人的概念，去探索性别和技术的观点。而妇女对技术的需求和使用，需要以妇女的主体立场去考察。比如在家务领域内，女性与技术的联系是含混不清的。很多女性使用新技术时，其实是不情愿但又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家务的职责要求她们使用技术。

3. 妇女使用新传播技术服务于社会

女性主义研究发现，尽管新技术为妇女组织和其他组织建立网络关系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但同时，就如人类资源问题和财政资源问题一样，对技术的接近问题和不可转变的组织化的基础设施等问题，一样存在。

此外，新技术加强了妇女传播网络有力的联系和力量。通过展现艺术作品、组织工作等是如何被用于挑战妇女和科技之间传统的观点，像丹娜和安娜这样的女性主义艺术家可以提供深入的见解。

4. 信息社会中的女工人和女职业者

女性主义学者发现，在高科技工业领域中，女性工人往往占据着低技术含量、琐碎和低层次的工作。在职业水平上，女性的发展前景并不光明。女工比男性竞争者有更多的劣势。但也要承认的是，技术带来了新的职业——网络女孩（web-girl）。技术不仅向自我呈现和网络凝视打开了大门，也通过设立真实生活的网页来使妇女可以寻求更多元的角色（作为角色制造者和角色形象）。

而且，研究证实，在IT中加入妇女，并不必然地保证技术对于男女同样友好。因为，女电脑程序员接受了传统性别分工的理念来设计技术、进行工作，而没有认识到传统性别分工带有性别和阶级的偏见。

5. 性别与教育

在性别和教育的很多研究中发现，女性和少数学生对于学习技术和电脑的热情并不高。而且会认为电脑和科技是属于白种男性的专有领地。而且，儿童所学习的新技术复制了传统的男性价值观，比如对于“竞争”的认识。

6. 发展中国家使用新技术的妇女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认为，技术话语是带有资本化的、种族歧视和西方观念偏见的。对发展中国家妇女与新技术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还相当匮乏。莱斯利指出了发展中国家传播与信息政策应该受到重视的四个领域：第一，妇女就业；第二，妇女对于信息的接近；第三，妇女再现；第四，妇女对适合的技术的选

择。库克斯等人指出，现有的关于“发展”的话语中，很少认为性别、发展和技术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那么，如果发展和科技的相关话语是殖民主义的，全球女性主义如何去质疑和解构传统的统治话语？而且，发展中国家的话语仍然停留在关注于研究对技术的接近权方面。如果男人和女人被排除于技术之外，不具有接近技术的权利，而且这种被排除是因为财富与教育资源的缺乏，那么，技术不能被用于男人和女人的赋权。

（二）三项研究缺失

米奇在文章中梳理了1990至2005年女性主义对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研究成果，指出了三条发展趋势，也是研究方面的三项缺失：对于消费关注的趋势；把使用技术和在电信及ICT工业中工作的女性，建构成“问题”和“困难”的趋势；对于信息社会全球经济所给予的不充分的关注的趋势。

1. 对于消费的关注

苏，罗丹，斯科特，赛门和威洛比都建议，女性主义更倾向于对传播和信息的女性消费的研究，而不是对女性产品的研究。为什么妇女对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消费具有研究价值？这个提问背后的潜台词是：两性使用技术是不同的，而且生理性别（sex）是构成消费的重要因素。

女性主义者不可以把“妇女和技术”当成过时的研究领域。因为妇女的次等地位很可能被解释成由于她的生理因素或物质上的匮乏所导致的问题。没有一个研究关注到以下这些提问：妇女花费了多少钱去购买科技产品和技术？她们是如何支付的？谁支付购买科技的费用？什么品牌为她们所购买？为何选择这个品牌？而且，她们是否意识到对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拥有与控制的观点？

这些问题明确地表明一个事实：消费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行为。无论妇女是否意识到，妇女正在参与到信息经济中来。忽视消费的经济方面的特征，就会表明科技是更文化性而非经济性的。

2. 所谓的“问题”和“困难”

女性主义学者们经常会把工业中的女工和职业者所面临的科技障碍记录下来。米奇却指出，技术主体并不制造出问题。问题是被知识系统和被组织所规约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所产生和界定的。换句话说，技术并不是唯一的事物，尽管它经常被表现得如此。它也不是仅仅被包括在电脑、移动电话等物体之中。福柯的观点是，科学与技术的知识早已经被主流话语所控制，因此，男性是唯一“懂得”科技的。妇女对于科技的恐惧、不适、不易掌握往往被误解为她们对于事物的理解力不够，而不对特定群体所规制的知识体系提出质疑。为了表明这个事实，妇女通常对于扮演传统女性角色的职业，如保姆、服务业等没有恐惧感。

统治性的技术知识体系是以阶级和性别为基础的，并且包含了西方价值观的偏见。技术的优势并不是能被所有人受益，特别是那些负担不起技术的人，更不会感受技术的优势。一些研究粉碎了在传媒、政治家和学者中流行的观念，即认为信息社会将促使从事信息工作的人进行终身学习。而实际上，妇女即使比一些男性更具备相当的知识与技能，却依然是最底层、程式化的乏味工作的承担者。网络在创造性的新媒体工业中依然是由男性为主导的。很明显的是，技术无助于超越劳工社会的阶层分层。因为技术不会自动打破性别关系和社会结构。妇女面对的障碍由来已久，并不是新的。

如果不去置疑基于市场的电信通讯和技术工业的新古典主义经济话语，那么妇女被“问题化”和“困难化”将不会解决。因为妇女的需求很少被包括进技术的设计和运行中。

3. 信息社会中经济的全球意识的缺乏

调查研究表明，信息社会中女工的角色更多的是不熟练的、半熟练的劳动力，如电话中心接线员，家务女工和工厂的工人。一些学者不情愿将软件工程师、网页创造者、游戏开发者等人称为工人。如果这几类人被称为工人，他们也是被称为生产知识而不是生产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工人”。把高科技职业者称为工人的这种尴尬现实，似乎加强了后工业社会的迷思，即认为这种信息工人将取代大量的普通工人。

全球女性主义学者应该对信息社会的逻辑提出质疑。如果不对信息社会和技术的经济本质论提出质疑,女性与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联系将不会被独立地去理解。

(三) 全球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总之,全球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分析,可提供至少三种方式来增进现有的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女性主义注解:首先,把电信传播和新信息和传播技术作为工业来认识;其次,展现电信传播与妇女的关系;再次,在对技术的接近方面,描画性别意识形态如何使不平等的财富分配自然化。

很明显,并不是每一个妇女在没有明确意识到的情况下,会被电信传播和新技术的优势所影响。因为,对她们来说,日常生活的信念是挣到足够的钱来为她们自己和家人获取食物、房屋。而且,那些从事着收款、旅行服务的妇女或普通的工厂女工,并不认为她们是信息时代下高科技的工人。

而且,从政治经济的视角看,在电信传播领域,妇女不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地选择她所扮演的角色。这个研究强调的是通过金钱、科技、形象、观念和物质产品的全球环境(虽然并不均衡),妇女全球化地实现彼此之间的连接。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资本主义并不是造成性别不平等的全部原因。而性别意识形态却可以为妇女的弱势地位提供充分的原因。

总之,全球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在四个研究领域提出了重要线索:

第一,全球政策和电信管理、新信息和传播技术、信息社会及它们与妇女的关系;

第二,妇女、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国家政策;

第三,跨国和国内电信传播、新信息和传播技术公司的性别政策;

第四,对技术女性消费的人种志研究,以及对全球经济逻辑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关系的理解。

四、女性日记体博客阅读中身份认同与解读文本的范式

(一) 身份认同的过程

丽娜(Lena Karlsson)在《女性日记博客阅读中身份认同的过程与偏好》^[4]中,重点探讨了日记博客的阅读行为——谁是特定博客的实际的读者?她们为这种阅读赋予了何价值?是什么促使她们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日记网页,又有什么机制导致她们再次访问这个网页?为了解析日记博客读者的阅读实践,作者对由四个30岁的妇女所撰写的四个独立的日记博客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关注人们“如何/什么时间/为什么”阅读博客。

这些博客的消费似乎被以性别、年龄、居住地、种族/人种、教育水平为基础的相似性的指标所指导。“得到证明”的诱惑促使读者进行自传性写作。同样,那些身为女性的日记博客读者,通过在生产的(理解博客的内容)和消费的感觉(阅读她人的博客内容)之间回荡,以及通过对博客文章结尾的观念的回想,来实现一种身份确认。

丽娜认为,一般的博客和吸引了流行媒介和研究组织相当大注意力的典型的具有话题性的博客,主要被当成任意延伸对话的知识建构或/和可改变的新闻。而博客中个人信息的公开,促成了媒介文化在公开、合理的情境中鼓吹“窥淫”。

职业白种男性被认为是介入公共空间的那些博客的主要制造者,妇女和儿童更倾向是日记体、自传体博客及网上刊物的制造者。日记体博客的典型特征如下:深度的个人化,充满了感情,以阅读吸引为兴趣;它在没有结局被看到的结构中发展,就像女性气质类型,与电视肥皂剧的特征相似。“无限接近而不是远离,消极,过度投入和过度标志,这些是对女性气质的典型描写。”

丽娜的研究表明,在很多网上社会空间中流行的身份表演(identity-play),并不是这样的日记体博

客的写作者和读者所预料的。因此，对此议题进一步的研究应该包括：博客对你意味着什么？你对它有何感觉？你是否曾经对 Winnie（一个博客写作者）的身份的真实性产生过怀疑？如果你同时是一个网下的自传写作的读者，你能描绘一下两种阅读经验的区别吗？

（二）解读文本的范式

根据霍尔（Hall，1980）、费斯克和哈特利（Fisk & Hartly，1978）参考帕金（Parkin，1972）的分类，可将媒介文本所建构的意涵，依受众解读的接受程度分成三类：1. 支配式解读（dominate Hegemonic Decoding），或称偏好解读（Preferred Reading）；2. 协商式解读（Negotiated Decoding）；3. 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 Decoding）。很多经验式的研究均采用了霍尔等人的研究范式，关注于消费者如何建构文本的解释性阅读。

此外，更关注于意义生产的研究趋势，在文学的接收研究中表现得也很鲜明，典型地体现在非经验性的方法论方向上。文学接收研究保持了对经验性框架的深切怀疑，它是探究实际的接收过程而不是文本中刻画的阅读可能性。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家皮尔斯使用浪漫的语法来表述读者和文本的关系。她提出我们的观点“把读者作为一个情人，她们的对象不是用来去理解文本，而是参与在文本之中。”传播学者施罗德发展了一种多面模式来解释读者对文本的参与，一个模式并非仅说明文本消费的解释和意识形态方面，也处理交错的阅读“六面向”：动机、理解、辨别、立场、评估和执行。

沃克指出，博客的互动性使读者能够贡献于书写实际的文本，通过超链接，通过文本，有机会创建自己的路径。博特则认为，在电子写作空间，文本每天的被阅读实际上是对文本的理解或实际的再写作行为，阅读就是理解。

参考文献：

- [1] Agnetha Broos and Keith Roe. Marginal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s the gender gap really diminishing? [A] Communication [C] . Vol. 30, 2005: 251 - 260.
- [2] Anne Scott, Lesley Semmens and Lynette Willoughby. Women and the Internet: the natural history of a research project [A] . [英] 辛西娅·卡特, [美] 琳达·斯泰诺. 批判性读本：媒介与性别 [C]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8.
- [3] Micky Lee. What's missing in feminist research in 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 Feminist Media Studies [C] . 2006, 6 (2): 191 - 210.
- [4] Lena Karlsson. Desperately Seeking Sameness: The process and pleasures of identification in women's diary blog reading [A] , Feminist Media Studies [C] . 2007, 7 (2): 137 - 143.